

人们的目光不禁为它们吸引,思绪仿佛又被带回远古的历史文明之中。出现在汇聚亚洲思想智慧和世界前沿信息的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,当这些承载着厚重华夏文明的商周青铜重器,散发着沧桑与美丽之美,

博鳌亚洲论坛上的青铜故事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图/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



西周应侯壶

今年4月14日下午,应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之邀,中国保利集团旗下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的“传承——华夏经典艺术(博鳌亚洲论坛)特展”在博鳌索菲特大酒店开展,这也是博鳌亚洲论坛组委会首次举办中国艺术品专题展览。四件商周青铜重器:遂公盃、应侯壶、应国簋、先鬲,带着远古的历史文明走到各国嘉宾面前。

走进100多平方米的展厅,隔着3000多年的悠远时光,四件商周青铜重器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气质和魅力:遂公盃古朴典雅,应侯壶精美气派,应国簋造型奇特,先鬲体大优雅,人们很难想象,那时候没有机器,没有严格的流水线,仅仅是通过模子铸成样式精美的青铜重器,纹饰却一点也不逊色于现代工业作品。

遂公盃改写中国古代思想史

乍一看,遂公盃其貌不扬,就是一只方方正正的青铜“饭盒”。实际上,这件青铜盃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,距今约2900年。保利文化集团总经理蒋迎春说,遂公盃原本有盖,现已缺失,它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内底所铸98字铭文上。铭文开篇记述了“大禹治水”的故事,后篇论述的内容却是“为政以德”。盃上所铸铭文字体优美,行款疏朗,且字字珠玑,几无废言。

铭文开篇即言,“天命禹敷土,随(墮)山,浚川……”记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、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

法,治平了水患,并划定九州,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献。在洪水消退后,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岗之上的民众下山,重新定居平原之上。由于有功于民众,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、民众之“父母”。随后,铭文又以阐述德与德政,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。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先生认为,这件铜盃为遂国国君所制,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“三皇五帝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。

此前,关于大禹治水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时期。“长期以来一直有关于禹和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议,个别外国学者甚至怀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,但是如果如果没有大禹,便没有大禹之子夏启创建的夏,更没有“华夏”之说。”蒋迎春说,遂公盃铭的发现,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,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,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在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,而夏为“三代”之首的观念,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。

德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项重要内容,德治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中国。遂公盃铭文中前后6处出现“德”,而且内涵颇为宽泛,如要求民众既要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,做人要“齐明中正”,还要孝顺父母、兄弟友善、婚姻和谐,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。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,顾念天下黎民百姓,只有这样,百姓才能“好其德”,君王统治才能长治久安,天下才能安定。蒋迎春说,这不仅是“周人尚德”的实证,还表明2900年前中国关于“德”的思想已相当丰富、系统,“德治”观念已经形成,而且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——孔子提出的“为政以德”的主张,其实只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。

整篇铭文堪称一篇政论性质的散文,其文辞、体例在两周金文中前所未见,却与现存《尚书》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。蒋迎春说,这对探讨中国古书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价值,因而这篇铭文被学者们被誉为“两周金文之最”。至今国际上已先后召开4次遂公盃研讨会,可见其历史价值非比寻常。

三件青铜重器各领风骚

相对遂公盃,另外三件商周青铜重器也各领风骚。

应侯壶原本一对,由于另一只正在长沙展出,此次人们只能有缘见到其中一只应侯壶。应侯壶铸造于距今

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。壶体通高55厘米,胎体厚实,工艺精美而又十分气派。壶上有大圈顶的盖,盖面中心装饰有一只团身飞舞的凤鸟。壶身装饰双线条的波纹,虽相对简洁但雄浑有力,颇具气势。器盖与器身均铸有13字铭文:“应侯乍(作)旅壶,其万年永宝用”,表明它们的主人是分布在今天河南平顶山一带的诸侯国——应国的国君。当年,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,把他的一个儿子(一说为弟弟)分封在今天的河南平顶山一带,建立了应国。应国长期拱卫周王朝,是周王朝抵挡汉水流域外族入侵的一支重要力量,与周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。

应国簋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食具,造型颇似秦汉时期的奁形尊,较为特别。簋的盖和器底上均铸有5行57字铭文,大意是:在周历十一月丁亥这一天,周王来到了卫国的姑城,他没有忘记应国公室,赞美了应国公室人员,并赏赐给他三十朋的贝和四匹马。为了纪念这件事,作了这件铜簋,用它早晚祭祀。这段铭文表明它是应国公室人员所铸,而依据其他铜器铭文,这位应国公室人员为应侯卣公之子,后来他和他的儿子也都当上了应侯。

蒋迎春说,在目前发现的应国有铭文铜器中,这件簋是字数最长的一件,而且它的内容对探讨应国的历史,特别是周王朝与应、卫等诸侯国的关系具有重大价值。此外,这件应国簋在工艺上也有别于同时代铜簋。“一般铜簋都是圈足,这件应国簋是圈足底下再加上4个小足,造型更加精美别致。”

四件青铜重器中,只有先鬲来自商代。这件商代晚期的饮酒具通高45厘米,属于存世少见的商代大型铜器。这件铜鬲三个丁字形足较高,造型颇显优雅。器外壁上饰兽面纹及蕉叶纹,具有当时青铜器装饰的典型风格。器底上有一字铭文“先”,表明它与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先方彝一样,都是商代“先族”的遗物。先族为商代大族,活跃在以山西浮山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。蒋迎春说,一般的鬲体型都较小,做工也不精美,这件先鬲是至今发现的体型最大、做工最精良的一件鬲,说明当时中国冶金技术、合金配比等都已达到完美的境界。



西周应国再簋



商代先鬲

中国青铜故事源远流长

雄伟的造型、古朴的纹饰、精湛的铸造工艺和丰富多彩的铭文,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,著称于世。从用途上来说,青铜器分为容器、兵器、乐器、车马器等几个大类。夏商周时期最主要器类之一的青铜容器,包括炊器、食器、酒器、盥洗器等,其中大部分青铜容器为礼器。

据载,中国青铜器的冶铸大约起始于原始社会末期。1977年在甘肃东乡县新石器时代末期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刀,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,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铸品。而近年来,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、河南、河北的龙山文化和甘肃的齐家文化遗址中,也陆续发现了早期青铜器和冶铜遗迹,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了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。此后,青铜器经历了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战国,直到秦汉时期走向衰落。

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则是青铜器的鼎盛期。曾有人这么述说商周青铜器:“身受奴役压榨的奴隶们创造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,展示了那一时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。那是绽放在野蛮的黑暗中的文明之花,是血泊雕琢而成的艺术杰作。”这时的青铜器制品种类繁多,形状瑰异,制作工艺极为精湛,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此时达到了高峰。

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是转变期。这个时期商文化的因素几乎完全消失,青铜器的造型、纹饰、铭文内容和铭文书体都强烈的表现出周文化的艺术风格。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是更新期。秦汉时期是衰落期。

由于冶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,青铜时代也随之结束,人们把注意力不再放在青铜铸造业上,日常用品中的铜镜、带钩、灯具和熏炉,也曾出现过不少精品,不过这仅仅是中国青铜器艺术的落日余晖而已。

看完此次特展,人们的心弦不禁为之拨动,正如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张祥留下的题词:“作为炎黄子孙,我们感到无比荣耀自豪。”



西周遂公盃